

90

商務印書館

改良與革命的中國情懷

康有爲與章太炎

湯志鈞著

商務印書館



改良與革命的中國情懷

——康有為與呂大直

王康紀念文集 卷一 王康紀念文集



90

商務叢書

改良與革命的中國情懷 ——康有爲與章太炎

湯志鈞著

商務印書館

玖什叢書編輯小組：江先聲 何渭枝
關秀琮 廖劍雲

小組召集人：何渭枝

改良與革命的中國情懷

——康有為與章太炎

作 者——湯志鈞

責任編輯——何渭枝

出 版 者——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鯉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

印 刷 者——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 次——199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199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6064 6

總序

我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傳統糾纏着。在這個糾纏的過程中，有人要與傳統徹底決裂；有人要默默繼承；有人要批判地重建；也有人要“解構”（deconstruct）傳統，開闢未來。當中的爭論此起彼落，莫衷一是，但回顧百多年來我們對這問題的主流傾向，恐怕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折衷方案仍然相去不遠。

或許，文明的演進，就是以這種“進三步、退兩步”的舞姿，在躊躇兜轉。在這條迂迴的路徑上，我們要踏得實在，但這並非意味我們可以原地踏步。我們更不應睥睨“更新”的觀念；因為新的理論觀念，正是進一步實踐的基石。

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在與“傳統”糾纏的過程中，我們總要不斷地對“傳統”作出新的詮釋及理解，以能更準確地掌握我們身處的位置。在主流的論述中，往往只以過去曾存在的文化作為“傳統”。這不是一套完整的觀念，因為我們不能單

看傳統裏“有”的文化，而忽略了傳統裏“無”的文化。若我們是認真及負責任地思考傳統，我們就不能只看“昨天所有”，而不注意“昨天所無”了。

從這個角度看，商務印書館的《玖什叢書》，就是建基於檢討“昨天所有”，同時又寄望於“昨天所無”之上。回頭看一看歷史，商務印書館也與“傳統”糾纏了很多年。本館於1897年成立時，中國正處於風雨飄搖、存亡絕續的時代。在這個形勢危急的關鍵時刻，一羣知識分子努力求取新知，主張變革圖存，於是以3,750元的資金，成立了中國近代歷史最悠久的出版印刷機構。他們的出發點，就是反省傳統文化，引介學術新觀點，及反映社會思潮新動向。我們出版《玖什叢書》的目的，就是紀念這九十年的歷史，並具體表示我們是實質地接上這根文化理想的棒子。

對於文化的熱情，昨天固然有，今天仍將繼續。

但昨天潛藏的問題，今天也逐漸湧現，而且直壓現代人的心靈。昨天的世界，還未被“灰色”所籠罩；昨天的文化，還未出現“後現代的困局”；昨天的政權，還沒有“合法性的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昨天的經濟系統，還沒

有面對過全盤崩潰的威脅。這些未必是全“新”的問題，或許只是老問題的新版本，但時移世易，“問題”所處的環境改變了，它就有了另一重意義。面對“新”問題，我們不單要反省及挑戰已有的方法及觀念，還要探索“昨天所無”的，並勇於做一個“進步分子”。

在這層意義上，《玖什叢書》雖然未必能夠緊緊跟上，但也一直嘗試朝着這個方向進發。第一系列的《玖什叢書》共十二本，都是希望深入淺出，簡明扼要地帶出哲學、社會科學及文化的新觀點，以切合當代的需要。

這系列叢書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這也是我們出版第二系列的動力。新一系列的《玖什叢書》仍希望以海內外富於創見的著作為主，而內容上亦希望能更多元化地開拓“未來所有”的思潮。

且讓我們以踏實的腳步邁進九十年代，讓我們在兜轉而前進的旅程中，反省“昨天所有”，探索“昨天所無”，一同玩味“玖”“什”。

商務印書館
編輯部

引 言

康有爲和章太炎，都是中國近代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一個是戊戌變法的主角，一個是辛亥革命的前驅。他們在學術上都留下了大量著作，一個闡發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一個精研古文經學的文字音韻，也是在思想文化上起過重要影響的人物。

康有爲比章太炎年齡略長，逝世較早，他們生活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國處在災難深重、社會動盪的時代，他們都有一腔愛國熱情，儘管政治主張不同；他們都有滿腹廣博學識，儘管治學方法不同。剖析這兩位“大師”的政治、思想面貌，將有助於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變化和學術遞嬗的探討。



圖一 康有爲



圖二 章太炎

目 錄

引 言	i
-----	---

一、中學和西學	1
二、古文和今文	22
三、論學和論政	43
四、改良和革命	70
五、《大同書》和《尨書》	88
六、經和史	146
七、保皇和排滿	161
八、共和和復辟	196
九、沉淪和頹唐	256

後 記	276
-----	-----

一、中學和西學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外國侵略者對中國發動了多次侵略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又發生了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英國、法國、美國、沙俄、德國以至後起的日本，一個個闖進中國，憑藉不平等條約，一方面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滲透，另一方面又侵佔中國周圍的鄰邦作為基地，把魔爪侵入中國的邊疆，災難深重的中國，面臨着被瓜分的危機。

康有為（1858——1927年），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戊戌變法後，易號更生；張勳復辟失敗，又號更姓，晚號天遊化人。出生在遭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和接觸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最早的地區，他是廣東南海西樵山銀塘鄉人。五歲，“能誦唐詩數百首”。六歲，讀《大學》、《中庸》、《論語》和朱熹所注《孝經》，父輩以“柳成絮”囑對，應聲答以“魚化龍”，得到贊譽。十一歲，父親去世，跟隨祖父康贊修接受嚴格的傳統教育，攻讀經史，“始覽

《綱鑑》而知古今，次觀《大清會典》、《東華錄》而知掌故”。這時，太平天國失敗不久，他“頻閱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①。

1876年（光緒二年），應鄉試不售，從朱次琦（九江）學。朱次琦教學重“四行五學”。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是經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和詞章之學。主張“濟人經世，不爲無用之空談高論”；“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康有爲受其影響，“以聖賢爲必可期”，“以天下爲必可爲”。又攻讀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人論述歷史的著作，於是“議論宏起”。接着，攻讀《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注》諸書，以及《楚辭》、《漢書》、《文選》諸文，“大肆力於羣書”。不久，“以日埋古紙堆中，汨其靈明，漸厭之，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復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乃“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爲聖人則欣然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②。國家的危亡，現實的刺激，使他對傳統文化學術產生懷疑。

1879年（光緒五年），入西樵山，居白雲洞，

專講道家、佛學之書，“養神明，棄渣滓”。剛好在北京任職的張鼎華（延秋）來遊西樵山，使康有為接觸到一些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影響和當時正在醞釀的改良思潮。從而“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自稱：“吾自師九江先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傳”。於是捨棄考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並以“經營天下為志”。閱覽《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還有《西國近事彙編》等西學書籍。

接着，康有為“薄遊香港”，接觸到一些西方事物，以為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專制要好得多。隔了三年，經過上海，“大購西書以歸講求”，從此，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

1884年（光緒十年），中法戰爭爆發，兩廣受到侵略，康有為“感國難，哀民生”，獨居一樓，“所悟日深”，寫了《人類公理》和《康子內外篇》。自稱是“合經子之奧言，探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天人之蹟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窮察後來”的作品。《人類公理》未見手稿，“公理書”的修訂稿《實理公法全書》和《康子內外篇》尚有存留^③。在《實理公法全書》的《凡例》中說：“凡天下之大，不外義理、制度兩端。義理者何？曰實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

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實理明則公法定，間有不能定者，則以有益人道者爲斷，然二者均合衆人之見定之”。他以爲幾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是“必然之實”，但它“不足於用”，於是“不能無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較虛”，本來沒有“定則”，只是“推一最有益於人道者，以爲公法而已”。甚麼是“最有益於人道”的“公法”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爲以爲人類平等是“幾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他對現實認爲不合幾何公理，如“人不盡有自主之權”，如“君主威權無限”等，認爲“實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來平等”的。

這種“平等”思想，在康有爲《自編年譜》和《康子內外篇》中也有反映，如說：“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務致諸生於極樂世界”。如說：“中國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輕女，崇良抑賤”。明明是不平等，却認爲是“義”。“習俗既定以爲義理，至於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婦女卑抑不學而無所識”。這種“抑”之極的不平等現象必需改變。“物理抑之甚者必伸，吾謂百年之後

必變三者，君不專臣不卑，男女輕重同，良賤齊一”④。那麼，所謂“公理”，實際就是平等，也就是所謂“平等公同，以致諸生於極樂世界”。這些，有其沾染佛教哲學的迹象，但佛教講“出世”，康有為却要“入世”，要“經世”，於是“參中西之新理”，擬出“平等公同”的圖象，從事“公理書”的撰述。這樣，他這時的著作，除存有中國傳統學說外，還滲透着西方資本主義的東西，康有為“公理書”、“內外篇”的醞釀和撰述，象徵着一個封建知識分子走向資產階級改良的歷程，《實理公法全書》和《康子內外篇》也可視為中國人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早期撰著。

經過幾年的摸索，康有為以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很可以救中國，要救中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

康有為學習西方，是注意到各個方面的，但他又不是甚麼都學，而是有所取捨選擇。

他倡導維新變法，對於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經濟、軍事、文教措施，當然是注意的。他盡力瀏覽這方面的翻譯本西書，例如康有為最早閱讀的是《西國近事彙編》和《環遊地球新錄》。稍後，“大講西學”、“欲輯《萬國文獻通考》，并及樂律、韻學、地圖學”，注意社會科學。同樣，他也重視自然科

學。

還在1883年，康有為即“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記、諸人遊記皆涉焉”^⑤。他在涉獵西方社會科學的同時，也閱覽西方自然科學書籍。“百日維新”前刊布的《日本書目志》，列了十五門，即生理門、理學門、宗教門、圖史門、政治門、法律門、農業門、工業門、商業門、教育門、文學門、文字語言門、美術門、小說門和兵書門。其中生理門，包括內科、婦科、兒科、解剖學、生理學、衛生學、處方學、診斷學、內科學、外科學、皮膚病學，眼科學、齒科學、婦產科學、兒科學、精神病學，以至針灸、獸醫學等。理學門包括物理學、理化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礦山學、地震學、博物學、生物學、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等。農業門包括農政、農業化學、土壤、肥料、農具、稻作、果樹栽培、圃業、烟草、林木、害蟲、農曆、畜牧、蠶桑、茶業、漁業等。工業門包括土木、機器、電氣、建築、測量、匠學、手工、染色、釀造等。儘管他分得不那麼科學，也不那麼嚴格，但方面之廣，搜羅之勤，在當時的條件下，確實難能可貴。

社會科學是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各門社會科學，都屬於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範疇。自然科學

則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質形態、結構、性質和運動規律的科學，是人類改造自然的實踐經驗，即生產鬥爭經驗的總結，他的發展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並反轉來推動生產的發展。社會科學的發展，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而自然科學的成果，也每為社會科學所吸收。由於中國過去長期是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後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故步自封的偏見和生產狹小的限制下，中國經濟處於停滯、落後的狀態，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科學技術的進步，却促進了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康有為要求中國富強，要求變法維新，非常注視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及其作用。

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即指出：“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強調“通古今，達中外”。提出“今宜改武科為藝科，令各省、州、縣遍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⑥。所謂“藝科”，主要是工藝，主要指自然科學的各種學科。在《日本書目志序》中又予發揮：“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砲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學、新法之書。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學，理則心倫生物，氣則化光電重，蒙則農工商礦，皆以專門之士為人，此其所以開闢地球、橫絕宇內也”^⑦